

族群冲突、极端主义 与马里安全形势

陈阿龙

内容提要 2011 年中东剧变后，马里国内族群问题引发武装冲突，以北部地区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叛乱和中部地区农牧民冲突为主要代表。武装冲突的爆发是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活跃在马里境内以及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与族群冲突参与方之间存在复杂而多变的互动，并利用当地权力斗争建立了多样而广泛的联盟。马里政府处理族群问题政策失当不仅激化冲突，还将特定族群的普通民众推向极端主义阵营。在马里政府与极端组织的共同推动下，马里中部暴力活动呈现出富拉尼化的危险局面，马里实现族群和解将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

关键词 马里 族群冲突 极端主义 分离主义 图阿雷格族

作者简介 陈阿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2011 年中东剧变后，北非局势陷入混乱动荡，为恐怖主义向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扩散提供了机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 -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简称“伊马”组织）、“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ama' at Nusrat al - Islam wal - Muslimin, JNIM）^①、“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①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自称是“基地”组织在马里的正式分支，成立于 2017 年 3 月，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撒哈拉分支、马西纳营（Katibat Macina）、“伊斯兰卫士”组织（Ansar al - Dine）和穆拉比通组织（al - Murabitoun）等合并而成。

the Greater Sahara, ISGS)^① 和“安萨鲁伊斯兰”(Ansaroul Islam) 等极端组织纷纷进入马里及其周边地区。这些极端组织采取本土化策略, 充分利用本地矛盾招募成员、获取庇护, 建立广泛的联盟, 从而实现发展壮大组织的目标。2012 年马里国内族群问题引发武装冲突后, 极端组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有鉴于此, 本文拟系统梳理马里及其周边区域极端组织介入地区族群冲突的策略及其影响。

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

2011 年中东剧变发生后, 部分图阿雷格族武装人员返回撒哈拉—萨赫勒地区, 加入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图阿雷格分离活动。早在 21 世纪初, 以“伊马”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便开始在马里北部活动。经过重新分化与组合, 马里北部极端组织逐渐从叛乱活动支持者转变为暴力活动领导者。

(一) 图阿雷格族分离主义与极端组织合作的原因

一直以来, 图阿雷格人始终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② 追求独立成为一些图阿雷格人的理想, 它们甚至多次发起武装叛乱。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伊斯兰激进思想在马里北部广泛传播, 图阿雷格族内部也出现分化, 为极端组织与图阿雷格人进行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 图阿雷格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觉醒。历史上, 图阿雷格人虽未曾独立建国, 但高度分化的社会体系成为塑造民族意识的黏合剂。从阶层来看, 图阿雷格族社会上层是贵族和封臣, 中下层是自由民和奴隶。从组织单元来看, 图阿雷格族被分成多个部族, 其内部依靠家族维系。因此, 图阿雷格族的社会整合可以不依赖行政体系, 无论是殖民帝国还是主权国家时期, 部族和家族都起到维持图阿雷格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另外, 语言和文字也在图阿雷格社会发挥了重要的媒

①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 是一个遵循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 2015 年 5 月从穆拉比通组织(al - Mourabitoun) 中分离出来, 宣布效忠“伊斯兰国”, 主要活跃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马里三国边境地区。参见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Expanding Its Threat and Reach in the Sahel,”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islamic-state-in-the-greater-sahara-expanding-its-threat-and-reach-in-the-sahel/> [2022 - 05 - 19]。

② 图阿雷格人(Tuareg) 是由语言和文化相近的部落组成的松散族群, 而这是外部世界对这一群体的指称, 其实他们自称为塔马沙克人(Kel Tamasheq), 即说塔马沙克语的人。长期以来, 西方学术界坚持使用图阿雷格人这一外部的客位指称, 随着主位研究视角在现代民族学和文化学中逐渐得到重视, 国际学术界也开始使用塔马沙克人指称这一西北非地区的跨界族群。目前, 国内学术界仍然延续图阿雷格的称谓, 为保持学术连贯性, 本文依然使用该词。

介和传承作用。今天，图阿雷格人是世界上仅存的仍在使用提菲纳格语（Tifinagh）的柏柏尔人。通过使用相近的语言和文字，零星分散的图阿雷格人建立起紧密的文化联系。图阿雷格人的自我称谓 Kel Tamasheq 和 Kel Tagelmust，以及部落称谓 Kel Ewey 和 Kel Ayr 都含有介词“Kel”，该词表达了一种所属关系，展现出图阿雷格人强烈的部族归属感。

图阿雷格人的生存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二战结束后，非洲大陆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终结了殖民帝国在非洲的长期统治，但殖民主义仍然影响着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当时，非洲国家边界划分依然以殖民界线为标准，不仅导致图阿雷格人被分散在多个国家，而且引发民族歧视和经济边缘化问题。文化上，马里将自身定义为马里王国和曼德文明的继承者，但这种历史叙事遭到图阿雷格人排斥；经济上，图阿雷格人处于国家资源分配体系的边缘地位，该族聚居区难以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投资。面对如此社会境遇，追求民族独立成为一些图阿雷格人的理想，甚至为此发动武装叛乱，但是遭到马里政府镇压。随着时间推移，图阿雷格分离主义思想与文化动员已较为成熟，有关独立建国的诗歌、流行音乐和政治话语广泛传播。2012 年，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MNLA）成立，试图追求图阿雷格人独立建国。

第二，伊斯兰激进思想在马里北部传播。长期以来，图阿雷格人所在地区信奉一种形式独特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从法学角度来看是马利基派（Maliki），从宗教神学角度来说则是艾什尔里派（Ash‘ari）融合了某些苏菲派元素。^① 20 世纪 70 年代，西北非地区出现了一些宗教新思潮，并逐渐影响到马里北部地区。具体而言，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捐赠者的影响力逐渐增长，例如沙特阿拉伯捐建清真寺、医学诊所、学校等基础设施填补了相应缺口。伊斯兰各势力采取新方式凸显自身存在，例如在伊斯兰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担任职务。马里北部强调与南部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不同，马里北部穆斯林内部的竞争也日渐加剧，群体内部出现针对其他穆斯林领袖和宗教权威的反对之声，也出现关于伊斯兰正统与非正统问题的争论与对抗。

布道与传播先知预言社（简称“塔布利运动”）是极端势力在马里北部传播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主要代表。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利亚斯（Muhammad Ilyas）创建了塔布利运动，尤为注重培植个人虔诚和布道行

① Alexander Thurston, *Jihadists of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Local Politics and Rebel Group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11.

为。^① 该组织在毛里塔尼亚和马里以“达瓦”(Da'wa)之名为人们所熟知。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塔布利运动扩展到马里基达尔地区后,不少重要人物都曾加入该组织,包括图阿雷格世袭酋长所在的因塔拉(Intalla)家族成员,马里境内极端组织领导人伊亚德·阿戈·伽利(Iyad Ag Ghaly)和阿马杜·库法(Amadou Kouffa)。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传播影响到马里内部的族群关系,为曾经地位较低的群体提供了挑战宗教权威的理论武器。贝拉和桑海伊玛目开始公开批评伊佛哈斯(Ifoghas)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昆塔宗教权威的正统性。^②

第三,图阿雷格族内部分化为极端组织介入创造机会。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多属于阿达赫(Kel Adagh)部落联盟,其酋长继承权属于伊佛哈斯贵族部落集团阿菲拉(Kel Afella)部落的因塔拉家族。^③ 围绕族群权力,以因塔拉家族为代表的贵族派和以自由民为代表的非贵族派展开了斗争。

因塔拉家族采取多面下注的政治策略。作为享有世袭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因塔拉家族与马里中央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符合其根本利益,同时与本地平民派、“圣战”派以及分离派形成暂时联盟也有助于维护家族利益。因塔拉家族参与马里政治的途径较多:一是积极参与主流政治维系其在国家层面的政治话语权,包括参与选举及和平调解。二是在宗教思想领域维护自身正统地位,部分因塔拉家族成员曾短暂加入塔布利运动。三是参与极端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力,阿尔哈巴斯·因塔拉(Alghabass Ag Intalla)在 2012 年短暂加入“伊斯兰卫士”组织。^④ 四是庇护图阿雷格族叛乱分子,穆罕默德·因塔拉(Mohamed Ag Intalla)于 2013 年 5 月成立了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Haut Conseil pour l'Unité de l'Azawad, HCUA),该组织为退出“伊斯兰卫士”组织的图阿雷格人提供庇护。

非贵族派向图阿雷格社会等级体系发起挑战。20 世纪 90 年代,马里和平协议签订后,图阿雷格分离组织分裂成几个派系,其中包括由自由民组成的“解放阿扎瓦德革命军”(Armée révolutionnaire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ARLA),对贵族派的领导权形成挑战。但是,图阿雷格贵族派也利用极端势力削弱非贵族派,例如当马里变革民主联盟与“伊马”组织爆发冲突时,图阿雷格伊佛哈斯

① Gerhard Bowering (ed.),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39.

② David Gutelius, "Islam in Northern Mali and the War on Terr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25, No. 1, 2007, pp. 59 - 76.

③ Pierre Boilley, *Les Touaregs Kel Adagh: Dépendances et révoltes: du Soudan français au Mali Contemporain*, Paris: Karthala, 1999, p. 47.

④ Andy Morgan, "Alghabass ag Intalla: Interview with the Head of the MIA," January 2013, <https://www.andymorganwrites.com/interview-with-alghabass-ag-intalla-head-of-the-islamic-movement-of-azawadmia/> [2022 - 05 - 12].

贵族派成员私下撤出战斗，造成非贵族派成员独自面对极端组织的不利局面。另外，图阿雷格非贵族派还出现了亲马里政府派别，即“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GATIA），该派主要由自由民组成，并反对图阿雷格分离主义。

（二）图阿雷格族分离势力与极端组织合作的表现

极端组织从事非法经济活动，不仅能够维持组织生存，还有益于马里政府和北部地区。极端组织既是影响马里北部局势的新力量，也是其他势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2012年，随着马里政府失去北部领土的控制权，极端组织从叛乱支持者逐渐发展成为暴力活动主导者，而失去领导地位的图阿雷格温和贵族派代表人物伽利日益激进，最终彻底转向“圣战”主义。

第一，极端组织能够保护当地族群的经济利益。以“伊马”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是跨撒哈拉非法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早在2001—2002年，马里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已经意识到极端组织试图将武器、车辆和非法移民从马里北部运往欧洲，“伊马”组织前线指挥官穆赫塔尔·贝尔摩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在走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极端组织也是非法经济活动的保护者。“伊马”组织向贩毒者征收保护费，并在关键节点驻扎武装人员对走私活动征税。^①极端组织介入非法经济活动后，当地族群迎来阶层流动的机遇。21世纪初，可卡因走私收益破坏了当地社会的层级结构，参与毒品贸易成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策略，对下层群体极具吸引力。^②同时，极端组织利用获取的经济资源开展慈善活动，通过散钱、分药、医治病人等形式，弥补了当地政府的缺位，赢得一些民众的支持，使族群内部对待极端组织的态度出现分化。

第二，极端组织成为马里北部政治斗争的工具。外界普遍认为，2003—2009年是马里北部局势相对和平的一段时期，当时极端组织在经济层面惠及政府代理人和部分族群，使马里政府能够在当地建立稳定的依附关系，因此缺乏干预极端组织的意愿。从2009年开始，马里政府与极端组织的关系逐渐恶化。2010年马里与毛里塔尼亚发起联合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马”组织。从2012年开始，极端组织既追求扩大自身“领土”范围，又致力于实施伊斯兰法统治，最终招致法国主导的外部干预行动。21世纪前十年，图阿雷格人与极端组织的关系比较平稳，他们对极端组织的非法经济活动持开放态度，但拒绝极端组织提出的宗教主张。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试图建立一个世俗国家，引起穆斯林

① Stig Jarle Hansen, *Horn, Sahel and Rift: Fault - lines of the African Jihad*,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9, p. 69.

② Luca Raineri and Francesco Strazzari, “State, Secession, and Jihad: The Micropolitical Economy of Conflict in Northern Mali,” *African Security*, Vol. 8, No. 4, 2015, pp. 249 - 257.

群体的强烈不满，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压力，该组织加强了与“伊斯兰卫士”组织的同盟关系。

第三，图阿雷格温和贵族派的激进化。伽利是具有贵族血统的图阿雷格人，也是图阿雷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与贵族派决裂并彻底转向“圣战”主义，标志着马里北部图阿雷格人与极端组织的互动进入新阶段。伽利曾服役于卡扎菲的伊斯兰军团，但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图阿雷格第二次叛乱中属于温和派，叛乱后期还成为马里政府在北方的关键对话者。然而，伽利在图阿雷格第三次叛乱中失去了领导地位，可能是因其主张实行伊斯兰教法。^① 于是，伽利另立门户成立了“伊斯兰卫士”组织，开启了激进化转型。伽利完全转向“圣战”主义是图阿雷格内部权力分化与失衡的结果，狂热忠诚的“圣战”分子和图阿雷格伊佛哈斯部落贵族成员是伽利依靠的两大主要群体，但伊佛哈斯贵族在“伊斯兰卫士”组织中并不处于核心地位，而“圣战”分子的影响力逐渐扩大。2013 年法国干预后，极端组织遭受重大打击，伊佛哈斯贵族派选择重新回归主流政治，而已经失去领导地位的伽利只能继续留在“伊斯兰卫士”组织。

马里中部农牧民冲突与极端主义

目前，中部地区农牧民冲突是马里族群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破坏力甚至超过了分离主义运动。马里农牧民冲突的背景较为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和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极端组织积极介入，农牧民冲突的暴力程度急剧上升。对此，极端组织希望以族群冲突掩盖极端暴力，而政府则希望以极端主义掩盖族群冲突，回避自身应当承担的主体责任。在马里政府与极端组织的共同推动下，马里中部暴力活动逐渐呈现出富拉尼化。

（一）马里中部农牧民爆发冲突的原因

第一，土地和水资源稀缺是造成农牧民冲突的直接原因。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数据，超过 80% 的武装冲突发生在沙漠化所影响脆弱的干旱地区。^② 受地形与人口因素影响，马里中部土地资源有限，无法同时满足农业和游

① William Lloyd George, “The Man Who Brought the Black Rag to Timbuktu,”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2, 201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10/22/the-man-who-brought-the-black-flag-to-timbuktu/> [2022-05-16].

② Nsemba Edward Lenshie et al., “Desertification, Migration, and Herder – farmer Conflicts in Nigeria: Rethinking the Ungoverned Spaces Thesis,”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32, No. 8, 2021, pp. 1221 – 1251.

牧业扩大生产的需求,而且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均对农业和游牧业产生严重影响。几十年来,马里中部地区降水量出现反复波动现象,^①进一步放大了现有土地和水资源的稀缺性,迫使农业和游牧业两种经济模式只能向外扩张,以满足生存所需。历史上,生活在马里中部的多贡人(Dogon)曾长期被剥夺使用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利,甚至需要以接受富拉尼人、图阿雷格人奴役为代价来换取土地使用权,这使多贡人强烈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受益于法国殖民当局的安全保障和马里政府的种植业激励政策,多贡人在马里中部平原地带扩大了种植业规模,其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因此不可避免地侵占了牧场保留地和牧群迁徙通道。由于传统和官方的争端解决途径失效,最终导致农牧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

第二,政府治理不当加剧冲突。由于马里政府腐败和治理能力不足,冲突各方缺乏必要的安全感,于是转向依靠族群自卫组织维护自身安全。但是,自卫组织纪律性不足,甚至会主动发起报复行动,导致双方冲突不断。然而,马里政府缺乏主动化解农牧民冲突的能力和动力,迫于国际压力决定扶持亲政府民兵武装打击与极端组织联盟的族群。一方面,马里政府将富拉尼等族群与极端组织等同,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成极端主义问题,转移对自身执政不力、政策失当的批评;另一方面,马里政府扶持亲政府民兵武装能够弥补国家安全力量的不足,回应西方支持者要求其积极应对国内安全问题的压力。2012年,遭遇极端组织和叛乱势力攻击后,马里政府进一步支持亲政府民兵武装的发展,希望借助其力量打击“圣战”势力及其盟友富拉尼人。^②由多贡人组成的丹·纳·安巴萨古(Dan Na Ambassagou,意为“信仰上帝的猎手”)便是马里政府扶持的民兵武装之一,该组织甚至在几个较大的城市设立了训练营。^③亲政府武装力量的增强刺激了族群间紧张关系,也将富拉尼等族群进一步推向极端主义。

第三,宗教和历史因素造成族群间不信任。历史上,富拉尼等族群曾存在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富拉尼人扩张领地的行为被视为重建压迫性体系的尝试。在尼日利亚中部和南部地区,基督徒中间存在较为广泛的共识,即富拉尼游牧者是伊斯兰化的宣传先锋,他们与富拉尼游牧者之间的冲突更多是宗教性而非资源性冲突。与之相对应,富拉尼人认为他们遭受袭击的主要原因是宗教认同和游牧

- ① Martin Brandt et al., “Local Vegetation Trends in the Sahel of Mali and Senegal Using Long Term Time Series FAPAR Satellite Products and Field Measurement (1982 – 2010),” *Remote Sensing*, Vol. 6, No. 3, 2014, pp. 2408 – 2434.
- ② Marc – André Boisvert, “Failing at Violence: The Longer – Lasting Impact of Pro – Government Militias in Northern Mali since 2012,” *African Security*, Vol. 8, No. 4, 2015, pp. 272 – 298.
- ③ Tor A. Benjaminsen and Boubacar Ba, “Fulani – Dogon Killings in Mali: Farmer – Herder Conflicts as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African Security*, Vol. 14, No. 1, 2021, pp. 4 – 26.

者身份。在马里中部地区，多贡人对富拉尼人同样存在警惕情绪。目前，不到一半的多贡人信仰伊斯兰教，少数信仰基督教，部分信仰传统宗教。^①历史上，马里中部富拉尼人曾强迫多贡人改信伊斯兰教，并奴役多贡人。19 世纪，富拉尼宗教政治领袖在萨赫勒地区建立了一些神权国家，其中包括马西纳帝国（Empire du Macina，1812—1862 年）。由于该帝国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一些富拉尼人将加入“圣战”组织马西纳营作为恢复富拉尼人在马里中部统治地位的一种途径。面对日益增长的富拉尼人势力，不少多贡人心存畏惧，害怕再次成为富拉尼人的附庸。

第四，马里北部叛乱活动提升了极端组织的影响力。2012 年 1 月马里北部爆发的图阿雷格人叛乱，是阿扎瓦德独立建国运动的最新表现形式，涉及阿扎瓦德所代表的基达尔、通布图 and 加奥地区。这次叛乱导致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在马里北部和中部占据大片土地，并在当地民众之间造成复杂影响。一方面，马里政府与极端组织、叛乱势力的治理效果形成鲜明对比，部分民众开始暗中支持反政府武装。在法国军队发动“薮猫行动”（2013 年 1 月—2014 年 7 月）期间，莫普提（Mopti）地区由马里政府控制，出现了政府军集体惩罚富拉尼人的事件，引发富拉尼人的仇恨。与此对比，在极端组织控制这一地区期间，课税、掠夺和其他骚扰活动都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出于反对图阿雷格武装进入本族群聚居区的目的，并在极端组织反腐败、反精英、支持游牧民的宣传鼓动下，一些富拉尼人加入叛乱势力或极端组织。例如，“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MUJWA）中，一部分富拉尼人以加奥和梅纳卡地区为基地活跃在马里和尼日尔边境，另有一部分富拉尼人则回到莫普提地区加入极端组织。

（二）马里中部冲突各方与极端组织互动的表现

第一，马西纳营与当地族群的互动。马西纳营领导者库法主要从富拉尼族群招募成员，但不限于富拉尼人。具体而言，马西纳营主要的发展对象是在资源分配和身份问题上遭受不公的群体，包括早期追随库法的极端组织成员，因宗教、民族、经济等原因寻求保护或复仇的成员，赞同库法宗教理念的古兰经学校师生。在话语建构中，马西纳营采取模糊态度，不强调特定族群和阶层的利益。但这种模糊态度无法长久保持，随着库法将马里中部极端活动族群化视作扩大势力的重要手段，组织内部要求支持特定族群的态度更为坚决，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2019 年，富拉尼人与多贡人的冲突逐步升级，以富拉尼人为主体的马西

^①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Dogon People,”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ogon> [2022-04-19].

纳营招募了 100 多名多贡族极端分子，并将他们当作冲突调停者。但是，马西纳营的富拉尼族强硬派成员要求允许对多贡族发起无差别袭击。对此，库法一方面考虑接受强硬派的复仇建议，另一方面试探性地向强硬派发出停火提议。另外，马西纳营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向传统部族首领作出妥协也引发强硬派不满。这一系列事件迫使部分强硬派富拉尼极端分子转投“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最终成为 2019 年底以来两大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爆发血腥冲突的导火索之一。

第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与周边族群的互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是由“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领导人之一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拉威（Adnan Abu Walid al-Sahrawi）组建而成。该组织利用富拉尼人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自身塑造为富拉尼牧民的保卫者。2012 年马里北部武装冲突爆发后，富拉尼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日益紧张，其他族群的亲政府民兵武装“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和“阿扎瓦德救赎运动”便成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主要对手。“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被马里政府视为制衡图阿雷格叛乱势力的重要力量。2015 年阿尔及尔《和平与和解协议》签订后，“因加德图阿雷格人自卫团及盟友”向梅纳卡（Ménaka）地区转移，这刺激了“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向布基纳法索东部发展。“阿扎瓦德救赎运动”是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分裂出来的民兵组织，其主要支持者是与图阿雷格人毗邻的达乌萨克人（Daoussak），该族群不仅与主导马里北部叛乱的图阿雷格族存在冲突，也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支持的富拉尼族存在冲突。

第三，“安萨鲁伊斯兰”与周边族群的互动。2016 年，富拉尼萨拉菲主义传教士易卜拉欣·马拉姆·迪科（Ibrahim Malam Dicko）在布基纳法索建立了“安萨鲁伊斯兰”。该组织虽然势力相对较弱，但作为布基纳法索本土“圣战”组织，非常熟悉当地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在动员本地族群方面具有优势，采取多种策略和措施扩大其势力和影响力。首先，迪科利用自身宗教背景建立了伊斯兰慈善传教机构，并使用广播电台进行比较激进的传教活动，他所鼓吹的反宗教权威、反建制精英思想吸引了年轻的宗教人士和边缘化人群，世袭宗教领袖、部落首领以及慈善机构内部异议人士成为其袭击目标。其次，迪科虽然出身于富拉尼贵族家庭，但他针对本地阶层分化严重的情况，大力呼吁在富拉尼族内部和布基纳法索北部地区消除阶层不平等现象，以此争取普通民众支持。再次，迪科利用当地民众对本国政府及西方普遍存在的怨恨情绪，将自身塑造成本地利益和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当地民众认为，政府漠视偏远边境地区的发展，造成当地交通、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而外国企业只为掠夺矿产资源，缺乏对当地发展的回馈。此外，他还利用富拉尼族身份与马西纳营等武装组织结盟，接受对方的援助和培训，使富拉尼族极端武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跨境联合。

族群冲突、极端主义对马里安全形势的影响

族群势力与极端组织之间的互动对马里安全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极端组织通过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回应了民众对改善经济条件的期待，同时通过联姻和参与部族冲突的方式赢得特定族群的支持，从而为其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其次，在政府和极端组织标签化舆论宣传的推波助澜下，马里中部富拉尼族被迫成为这一地区各类冲突的参与者，导致富拉尼人转向加强与极端组织的联盟，其与周边族群的和解进程因此举步维艰。

（一）极端组织利用当地矛盾长期生存

首先，极端组织向当地一些族群提供参与非法经济活动的机会。由于国家治理孱弱和边境管控松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跨国犯罪猖獗，毒品走私、武器交易、人口贩卖、绑架勒索、盗伐盗采、盗窃原油等犯罪活动泛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包括非洲在内全球跨国组织犯罪总金额约为 8700 亿美元，是当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金额的 6 倍多。^① 活跃在马里及其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与犯罪组织之间互动频繁。一方面，极端组织直接从事犯罪活动。2003 年 1 月，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 GSPC）在撒哈拉地区绑架了 32 名欧洲游客，索取赎金 500 万美元。^② 2005—2011 年，“伊马”组织利用撒哈拉沙漠从事绑架人质活动，获取估计多达 7000 万美元的赎金。^③ 巨大的经济收益让极端组织有财力贿赂本地政府官员、执法人员、边境管理人员、社群领导、法官等掌权者。另一方面，极端组织还向从事犯罪活动的群体提供庇护，例如毒品走私集团，以获取经济利益。在此状况下，双方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寻找到了共同利益。

其次，极端组织为当地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弥补了政府缺位。经济方面，极端组织利用从事非法经济活动所获资金，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例如“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及分支机构、“伊马”组织

①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https://www.unodc.org/toc/en/crimes/organized-crime.html> [2022-05-15].

② Andrew Hansen and Lauren Vriens, “Background: Al-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2009, <http://www.cfr.org/north-africa/al-qaedaislamic-maghreb-aqim/p12717> [2022-05-20].

③ William Thornberry and Jaclyn Levy,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l-qaeda-islamic-maghreb> [2022-05-25].

等极端势力在控制部分领土后，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食品、饮用水、电力、燃气等服务。安全方面，极端组织通过建立法庭、惩罚犯罪、调停冲突等方式增加自身社会影响力。例如，“伊斯兰卫士”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治理机制，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还设立了可以联系其成员的热线电话，开设伊斯兰教法法庭，赞助慈善机构。^①“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在加奥地区建立了伊斯兰教法法庭。“伊马”组织则招募警察，建立治安系统，派遣治安专员处理安全问题。

再次，极端组织利用本地族群网络实现了本土化发展，其中尤以联姻模式和参与部族冲突模式的效果最显著。例如，2000年前后马里北部极端组织基本上都属于非本土性质，但此后萨拉菲主义的本土化进程逐渐深化，其主要原因有：第一，本地跨国伊斯兰传教运动逐渐转向萨拉菲主义；第二，非本土“圣战”运动开始与本土部落通过联姻结成同盟；第三，非本土“圣战”人员在法国“薮猫行动”中损失惨重，不少“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成员与当地富拉尼族联姻实现了本地生存和扩张，而参与族群冲突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极端组织本土化发展。

（二）马里中部暴力冲突的富拉尼化

在马里及其周边区域族群问题引发的暴力冲突中，图阿雷格族和富拉尼族的角色最为突出。图阿雷格人主要集中在马里北部，由其引发的暴力冲突主要源于民族自治和分离主义，集中于图阿雷格人与政府之间以及图阿雷格族内部。2012年爆发的图阿雷格族叛乱波及马里中部地区，进而引发中部族群对图阿雷格人的敌意，但这种敌意随着叛乱平息而消失。相对而言，富拉尼人在马里中部冲突中的角色更为复杂。

马里中部冲突包含多个层面：第一，极端组织针对马里政府和外部行为体的暴力活动；第二，富拉尼族内部因资源分配不均和阶层分化而发生冲突；第三，富拉尼族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部族武装冲突；第四，马里政府军存在针对富拉尼族的集体惩罚行为。如果将富拉尼宗教极端分子仇视西方文化的态度纳入考察，可以说富拉尼人出现在马里中部的各类暴力冲突之中。马里中部暴力冲突的富拉尼化是多方行为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极端势力借助富拉尼问题实现本地化生存和发展。马西纳营领导人库法主要从富拉尼族招募成员，2018年库法在一段视频中用富拉尼语号召其他国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li: Avoiding Escalation,” *Africa Report*, No. 189, July 2012, p. 16.

家的富拉尼人进行“圣战”。^① 该组织试图将极端主义与富拉尼族进行捆绑，实现极端主义的族群化，这种策略一方面可以淡化极端暴力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其塑造成族群冲突而非“圣战”暴力，另一方面试图赢得富拉尼游牧族群的好感和支持。除此之外，其他两个极端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安萨鲁伊斯兰”也把富拉尼人作为招募对象。

其次，马里政府对富拉尼人实施集体惩罚，将部分富拉尼人推向极端主义阵营。2012 年马里北部危机爆发后，叛乱势力和极端组织占据了马里北部和中部，在法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后，该地区大城市的控制权才重新回到马里政府手中，但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仍然处于极端组织的控制下。在此情况下，马里政府与富拉尼族的关系趋于紧张。“争取西非唯一性和圣战运动”指责马里政府军与极端组织合作杀害了 40 名富拉尼平民。^② 马里政府军任意逮捕富拉尼族嫌疑人，最终导致富拉尼人不再信任政府军。同时，马里政府通过支持亲政府民兵武装，打击“圣战”势力及与其结盟的富拉尼人，其中包括多贡民兵组织丹·纳·安巴萨古，该组织从保护多贡人村庄升级为主动袭击富拉尼人村庄，进一步激化了族群矛盾。^③ 马里军队内部普遍存在将富拉尼人与极端分子等同的观念，富拉尼人感受到这种民族标签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他们担心安全问题会出现富拉尼化现象，也就是将游牧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同化。由此，很多富拉尼人在现实威胁和极端组织反政府、反建制派精英、支持游牧等宣传口号的吸引下，与极端组织建立联盟。

（三）标签化叙事进一步激化冲突

2012 年之后，马里国内农牧民冲突远非简单的族群冲突，考虑到政府支持多贡民兵武装对抗富拉尼人以及支持富拉尼人的极端组织，可以说农牧民冲突已经演化成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同时，不少多贡人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多贡民兵武装的暴力行为，转而与富拉尼人进行和谈，这导致多贡人内部冲突。此外，富拉尼人武装内部也存在多个极端组织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因此，马里农牧民冲突涉及不同利益的行为体，将冲突简单化、标签化的舆论叙事对实现区域和平与安

① Alexander Thurston, *Jihadists of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Local Politics and Rebel Groups*, p. 197.

② “Mali: Le MUJAO accuse l’armée malienne d’avoir massacré 40 Peuls,” *Alakhbar*, January 13, 2013, [http://fr.alakhbar.info/5772-0 Mali Le MUJAO accuse larmee malienne davoir massacre 40 Peuls. html](http://fr.alakhbar.info/5772-0-Mali-Le-MUJAO-accuse-l-armee-malienne-davoir-massacre-40-Peuls.html). [2022-05-13]

③ Tor A. Benjaminsen and Boubacar Ba, “Fulani – Dogon Killings in Mali: Farmer – Herder Conflicts as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pp. 4 – 26.

全弊大于利。

第一，将农牧民冲突原因简化成资源争夺的叙事模式淡化了马里政府的主体责任。包括马里中部在内的萨赫勒地区农牧民冲突有着复杂根源，从政府角度而言，过度强调冲突的族群特征有利于回避自身存在的治理失当。马里国内舆论宣传将富拉尼族群贴上极端主义标签的叙事策略，一方面为政府支持特定部族武装，弥补官方安全力量不足，进行了舆论准备；另一方面造成针对富拉尼人的民族歧视和集体惩罚暴力行为增多，长远来看无益于马里国内推进和实现民族和解。

第二，极端组织诉诸民族化叙事争取富拉尼族群支持。马里中部极端组织马西纳营以古代富拉尼人建立的马西纳帝国为标签，试图将本组织与富拉尼族进行捆绑，从而实现极端主义族群化的目的。目前，关于马西纳营在多大程度继承了帝国遗产仍存在争议。有人指出，马西纳帝国建立者瑟古·阿玛杜（Seku Amadu）的陵寝正是毁于该极端组织的暴力活动。^①由此看来，以马西纳命名可能只是极端组织吸引富拉尼族成员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世界报》和一些马里当地媒体使用“马西纳解放阵线”（Macina Liberation Front）指称该组织，^②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人们对于该组织可能推行大富拉尼主义的担忧。

第三，富拉尼精英阶层拒绝政府和极端组织的双重标签化叙事。针对舆论宣传中夸大马西纳营与富拉尼族群关系的做法，富拉尼学者和政治人士认为，马西纳帝国信仰卡迪里耶（Qadiriyya）和提泽尼亚（Tijaniyya）苏菲教派，而马西纳营领导人库法属于瓦哈比派。在该极端组织暴力活动的受害者中，富拉尼人比其他族群要多，因此他们反对将马西纳营的暴力活动描述成为富拉尼人的征服活动。^③富拉尼人在马里国内政治中地位较高，并且在中央层面形成了富拉尼族主流精英派，例如前国民议长阿里·努乌姆·迪亚洛（Ali Nouhoum Diallo），前总统阿尔法·科纳雷（Alpha Konaré）的母亲和妻子均为富拉尼人。富拉尼族精英与库法的政治理念不同，面对国内对富拉尼人的妖魔化，他们试图游说中央政府

① Adam Thiam, “Signature du jihadiste Hamadoun kouffa? Le mausolée du saint Sekou Amadou dynamité vers Mopti,” *Le Républicain*, May 2015, <https://www.maliweb.net/editorial/signature-du-jihadiste-hamadoun-kouffa-le-mausolee-dusaint-sekou-amadou-dynamite-vers-mopti-947542.html> [2022-06-02].

② “Al-Qaeda - Linked Macina Liberation Front Claims Attack on Malian Military Base Near Capital,” https://www.lemonde.fr/en/international/article/2022/07/23/al-qaeda-linked-macina-liberation-front-claims-attack-on-malian-military-base-near-capital_5991209_4.html [2022-07-25].

③ Amadou Sallah Cisse, “Kouffa n’a jamais travaillé à la réhabilitation du Macina,” *Le Reporter*, January 2019, <https://malijet.com/actualite-politique-au-mali/flash-info/221758-kouffa-n-a-jamais-travaill%C3%A9-%C3%A0-la-r%C3%A9habilitation-du-macina.html> [2022-06-09].

采取温和措施应对暴力活动，同时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与库法领导的极端阵营进行接触。由此可见，极端主义的标签已影响到富拉尼人，他们试图通过不同方式反对舆论叙事对富拉尼人的标签化和妖魔化。

结 语

2011 年中东剧变后，北非地区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政治动荡促使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图阿雷格人返回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并加入图阿雷格叛乱；另一方面，政治动荡也为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扩散提供了机遇，萨赫勒地区极端暴力活动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资源稀缺、治理失效、历史仇怨等因素，与叛乱势力、极端组织的活动相互交织，共同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农牧民之间的冲突，族群矛盾与极端主义成为萨赫勒地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作为萨赫勒地区遭受族群冲突和极端暴力活动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马里族群问题和极端主义在其内部的叠加互动具有代表性。马里图阿雷格人叛乱和农牧民冲突有着复杂根源，极端组织敏锐地利用了族群冲突中的各方势力，建立了广泛而有效的联盟，从而在马里及其周边区域逐渐发展壮大。马里中部暴力冲突在马里政府和极端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富拉尼化现象，而富拉尼族群在马里国内政治中被标签化和妖魔化，也势必对马里安全局势产生长远影响。

（责任编辑：贺杨 责任校对：李若杨）

state building. The legacies of colonial rule, the harm of tribal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competi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Biafran separatist movement. The Biafran Wa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Nigeria'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On one hand,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voiding the division of the country and has maintained the national unity.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r has caused major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damage, inflicting a great deal of trauma on the entire country and nation. The war has become heavy historical memory for the Igbo and many other minorities in south – east Nigeria, and has also become the root of the resurgence of the Biafran separatis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90s.

Keywords: Nigeria, the Biafran separatism, the Biafran war, nation – state building

Authors: Zhang Yongpen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Liu Yuhan, Master's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Ethnic Conflicts, Extremism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Mali

Chen Along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Arab Spring took place in 2011, the internal ethnic issues in Mali have triggered armed conflicts,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Tuareg rebellion in the north and the herder – farmer conflicts in central Mali. Those conflicts ar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interacting factors including natural, geographical, social, historic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nes. Extremist groups in Mali and bordering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interactions with various actors in the conflict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various and broad alliances in the local power struggle. The improper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Malian government in tackling ethnic conflicts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s and pushed individuals of certain ethnic groups towards extremist groups. As a result, central Mali is facing a dangerous situation where the Fulani are regarded as terrorists and extremists. Mali will face more tough challenges on its road to realiz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Keywords: Mali, ethnic conflicts, extremism, separatism, the Tuareg people

Author: Chen Along,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Research on Egyptian History and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ction on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ystem of World History**

Yu Pei

Abstract: The year 2022 marks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Egyptology. As a subject that probes int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though Egyptology has a history of 200 years, it is still full of vigor and charm and has broad prospects. It has been 120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gypt Modern History*,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Shiba Shiro, was published, and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more and more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Egyptian history and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Chinese studies of Egyptian history in the midst of historical upheaval, we can obtain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world. The study of Egyptian history in China was initiated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people suffering unprecedented calamity,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sharing the common fate with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Chinese scholars of world history,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new mission of the world history subject in the new era and continue to advance Chinese research on Egyptian history in order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China's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ystem and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research on Egyptian history, Egyptian modernization, intellectual syste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hor: Yu Pei,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